

博士硕士论坛

· 黄宗羲政治哲学思想研究 ·

论黄宗羲对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

夏文强

(黑龙江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摘要]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因此,在中国古代政治发展史上,政治思想大多是为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延续而存在的。黄宗羲生活于明末清初之际,那是一段社会极其动荡、人民生活极其困苦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相对繁荣的历史时期,之所以说它繁荣,是因为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启蒙思想式的人物,黄宗羲就是其中之一。在政治制度领域,黄宗羲在考察和设想君主制在历史上存在的形式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观点,猛烈地抨击了君主专制制度;在思想文化领域,他提出了“人各自私,人各自利”的理论,冲破了传统儒家义利观对人性的束缚;在经济领域,他大胆地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点,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发展。黄宗羲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是深刻的,是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灿烂的一笔。

[关键词]黄宗羲;君主制;天下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6)11-0130-06

虽然人类有着漫长的历史(考古学意义上),然而,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并不长,在这不长的历史中,称得上是文明史的则更加短暂了。在这短暂的文明史中,乱世又多于治世,而治世中的百姓生活也不轻松。由此可见,人类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根据马克思划分人类社会发展的阶级斗争理论,中国从秦王朝建立到清王朝覆灭,一直处于封建社会之中。开始于秦王朝的君主专制制度一直存在了将近两千年的时间。到了明清时期,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也趋于衰落了。黄宗羲作为中国启蒙式的思想家率先向这一腐朽的制度发起了攻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黄宗羲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黄宗羲(1610—1695年)生活于明末清初之际,当时的社会是一个政治剧烈动荡的社会。从国家层面上讲,内有农民起义,外有敌人入侵。黄宗羲目睹了明末清初的社会现实,并看到社会的动荡给老百姓带来的深重的灾难,他本人也遭到了当时官僚地主的政治迫害,促使他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地反思,形成了一股进步的思想潮流。

(一) 明末弊政

万事万物都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一成不变的事物难免被时代淘汰,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总是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政治文化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君权神授”思想的支配下,中国古代的皇帝有着绝对的权威,且创业之主的权威会影响到子孙后代,其所立之法无人敢于变革,

[收稿日期]2016-10-20

[作者简介]夏文强(1990-),男,河南周口人,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外政治制度研究。

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以至由于政策失灵,导致社会矛盾有所激化。明末社会动荡不安,各种不安定因素呈现了出来,那些弊政也成了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1. 宦官专权。史学家言“明亡于宦官之手,若论宦官之害,无甚于明也。”将明朝灭亡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宦官专权,是比较牵强的,但明末宦官的危害确实很大。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强化皇权,故而废除了宰相,凡事亲力亲为,又因担心有人夺取自己的江山,故过多地依赖宦官,因为他认为宦官没有子孙,威胁不到皇权。明朝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宦官的权力急剧上升,甚至同以前宰相的权力不相上下。明朝末年大宦官魏忠贤更是权倾一时,给明朝的官僚机构以沉重的打击,以至于朝中无可用之臣,边疆无可堪大任之将。宦官遍布于国家各类官僚机构中,直接导致文官武将同宦官的矛盾不断深化,葬送了明朝天下。

2. 赋税沉重。明朝末年,土地兼并严重,大地主、大官僚占有了大部分的土地,却只承担很少的税收,而占有少部分土地的广大农民,却承担了明朝大部分的税收。可谓“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当时东北后金势力渐强,已经威胁到了明朝,加之北方蒙古一直骚扰边境,为了维护边境的稳定,需要大量的军费。唯一的办法就是加税,而且只能从普通老百姓身上加,豪强地主的税是征不来的。明末三饷就是在正税之外追加的赋税,给明末农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以至于农民纷纷弃地不耕,流民四起。满清入关之初,多尔衮曾大义凛然地指责说“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后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

总的来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未能摆脱灭亡的命运,自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到了明朝末年各种弊政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矛盾积累到了一定程度的结果。然明末弊政又何止上述两种,历史学家可以一一列举出一大堆明末的弊政,诸如土地兼并严重,朋党之争,君臣昏庸,等等。

(二) 农民起义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力量。农民起义总是扮演着促使王朝灭亡的先鋒角色,随之就会在新王朝的管理下安于现状。一治一乱的循环成了中国历史难以摆脱的怪圈。统治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农民阶级的重要力量,也尝试着改善农民的生存环境。然而,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农民阶级始终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力改变现状。明末农民起义是历次农民起义中最波澜壮阔的一次,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推翻了明王朝,之后又在外族入侵的过程中很快消失于明末的历史舞台之上,它是促使明王朝灭亡的主要力量,既显示了农民阶级的强大力量,又突出了农民阶级固有的局限性。黄宗羲目睹了农民揭竿而起的现实,又在这股洪流中看到了老百姓面临战争时的无力,因此,他极力主张让利于民,对君主专制制度给予沉痛地批判。

(三) 清兵入关

内乱起外患必生,后金政权起于明万历年间,崇祯年间已经发展成为了一股威胁明朝政权的强大力量。加之明朝内部已经动乱四起,明王朝疲于应付。当李自成的大军攻破北京城宣布明朝灭亡的时候,清兵也已经在关外虎视眈眈了,试图夺取中原的锦绣江山,这股新生的力量迅速将农民起义军赶出了北京城,并在不长的时间内完成了改朝换代的大业。

清末入主中原在某种意义上阻断了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上升发展。当时的西方世界经过了新航路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人类文明前所未有的高度迅速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并开始影响到闭关锁国的明王朝。当此之时,明朝内部也酝酿了资本主义的要素,又受到外国的冲击,很有可能跟上西欧的发展步伐。然而,清兵的入关进一步加强了君主专制统治,使中国的君主制发展到了顶峰,同时君主专制也在一定程度上走向衰落。因为,当周围的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中国这个大国又怎么可能独善其身呢?清兵作为外族入侵者遭到了明末士大夫的顽强抵抗,黄宗羲虽然对明王朝进行了猛烈地抨击,但却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坚决抵制外族入侵,后来看到清王朝日渐稳固,便奋笔疾书直指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他是中国启蒙思想家中的先行者,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黄宗羲思想的具体内容

(一) 君王说

人类历史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社会条件,因而会有不同的社会制度与之相适应,我们后人应当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评判当时政治制度的优劣。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而存在,并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变而不断演化的。君主制是一种很古老的制度,至今还存在于世界上的一些国家中。可以说君主制度在中国这片土壤上获得的成功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所无可比拟的。秦朝的统一确立

了中国此后近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也正是秦朝的统一才造就了现在的中国。到了黄宗羲的时代,君主专制制度已显现出了没落的迹象,外界社会的变革、内部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统治阶级中有识之士的觉醒都促使一些人开始反思甚至大力批判这一制度。当时的西方思想家也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同腐朽的政治制度作斗争,并试图创设一种更适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制度。而在世界的东方,黄宗羲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对君主专制制度发起了进攻。

1. 无君时代。黄宗羲认为在人类的初始阶段,整个社会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在这个阶段,人与人之间没有分工与合作,更没有出现政治体将人类结合起来,而是每个人在天性的驱使下追寻着自己的利益,在追寻私利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矛盾和斗争。黄宗羲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争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明夷待访录·原君》)无君则天下混乱无序,人们都孜孜于一己之私利,纷争不已,这无疑属于乱世。虽说是乱世,但人们尚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自己的私利。无君时代和西方思想家眼中的人类原初状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他们也大都认为人类社会的这一阶段是不可能持久的。

2. 贤君时代。无君时代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之中,人与人之间纷争不已,因此必然会有人站出来振臂高呼,将人类团结起来,使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并且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中国的儒家思想家们言必称三代,而黄宗羲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虽然批判当时残酷的君主专制制度,但内心还是渴望贤君圣主治世的。他所说的贤君时代无疑是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治理天下的时代,这是一个有君且王者大公无私的时代。黄宗羲认为君主就是有人站出来为天下兴利除害。在那个时代“天下为主君为客”,古代圣王皆公而忘私,“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明夷待访录·原君》)。贤君时代属于人类的盛世,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幸福无比。当然了,在某种意义上这只是黄宗羲的“理想国”,他完全忽略了当时人类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现实。

3. 暴君时代。这一阶段是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的社会。此时“公天下”变为“家天下”,井田制遭到完全的破坏,天下的百姓处于皇帝忠实的奴仆——各级官吏的残酷统治之下。此时的君主一心为自己谋私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有君反而不如无君,“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因此,君主成了天下之大害。黄宗羲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君主专制的根本危害,那就是君主为了一己之私利,一家之私利,将天下臣民玩弄于股掌之间,从不会为天下臣民的利益着想,这个时代正是黄宗羲着重批判的时代。

总之,黄宗羲认为“无君则天下利不兴,害不除;有君而君心不公也违背设君之道”。设立君主是为公众谋取利益的,君主不应该代表一人、一家之利益,应代表万民之利益。有君且君心公道是黄宗羲眼中的理想政治模式。这说明黄宗羲依旧没有突破中国古代对贤君圣主的渴望思想的禁锢,但黄宗羲毕竟打破了传统儒家思想的义利学说,将利益作为衡量民众幸福与否的尺度,为中国此后政治思想的发展开了先河。

(二) 君主乃天下之大害

黄宗羲认为,春秋以来,天下有乱而无治,其根本原因是君主的心术不正,违背了公天下的设君之道。黄宗羲同中国古代的其他思想家一样,从伦理政治观的角度希望出现明君圣主,将人民的命运寄托在不可捉摸的人性之上,认为只要君主不为私利,必能为天下兴利除害,实现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景。

1. 公私论。黄宗羲打破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义利说,提出了“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的人性观念,并肯定了这一人性观念的合理性,这同西方的功利主义思想家提出的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有些相似。黄宗羲以此为基础批判君主在先义后利的意识形态支配下专天下之利的本质。三代以降,君主在观念上确立了“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于是“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政治权力必将围绕着如何确保君主制的稳定来运行,在实践过程中政治权力就变成了为君主谋取私利的工具。一切思想、文化、法律、习俗、政治、经济等手段的运用都是以此为目的的。如何保全一个现存的政体是统治者竭力进行的一个不自觉的选择,而生活于其中的民众则更多的是被动地适应它。中国的儒家思想长期主张人性善,强调先义后利,这实际上是统治阶级内部将君主专制制度在思想文化上合法化的一个手段,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当先义后利的观念深入人心之后,人们便不会经常性地同统治者产生利益上的矛盾,还会通过不断完善自身的道德修养使之更加适应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最后使得君主制更加平稳牢靠,这也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持续如此之久的一大原因。黄宗羲在“人各自私,人各自利”的观念引导下深刻地揭示了义利观念的虚伪,并认为君主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天下万民各自的合理利益,而不是为了一己私利。黄宗羲说“以我之好恶,而为天下之好恶,怨

也,仁也。”这告诉我们君主不但不能大肆掠夺民众的财产,反而应当满足民众的合理愿望,这才是仁政。

2. 王霸论。黄宗羲的王霸论与朱熹等著名理学家的认识很接近。他认为“王霸之分不在事功而在心术”,战国以来,人主之所求,策士之所揣摩,只在利害二字,帝王皆无王者之心,而行霸者之事,就连汉唐盛世的帝王心术也只是一个霸字。这必然导致“举世尽在利欲胶漆之中”(《孟子师说》)。“古者圣君治世,以百姓心为心。今者帝王皆以天下为私产,玩弄于股掌之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亦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黄宗羲认为,历朝历代帝王,不论是创业之主还是守成之君,他们为了争夺天下,不惜一切手段聚敛财富,以至于生灵涂炭,皆是为了一己之私利。他们是以牺牲千万百姓的生命为代价取得霸业的。一旦成就霸业之后,又会采取各种手段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那些心术不正,一心想着自己的霸业的帝王是人间一切祸患的根源。黄宗羲打破了传统的王霸论,传统思想家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出。由于王朝之间的更迭,后人将一切罪责都归于末代君王身上,却从没有想过那些开国之君的危害。他们起于乱世,聚众而夺天下之产,尸骨如山,只为了走向政治权力的顶峰。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君主一人获得了不受约束的权力,对圣君的期待也如水中月镜中花一般的不现实,君主一人的霸业同时也是天下万民的祸业。

3. 君主危害的具体表现。第一,王权之争惨烈。黄宗羲认为在君主专制政体之下,很容易出现围绕最高权力而发生战争的可能。君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人人对其敬畏有加,人人又对其虎视眈眈,君主以天下为私产,而且会千方百计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而“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众”,结果必然导致王朝不断更迭,强者逐鹿中原,而天下涂炭。黄宗羲虽然指出了朝代更迭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但却仅仅归因于“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众”,未免过于浅显了。而且围绕最高权力的争斗也存在于皇权内部之中,这相比于王朝更迭则更加频繁,是经常性的,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同样非常大。第二,君民关系恶化。黄宗羲认为,皇帝制度的特征之一是“以天下而养一人”(《孟子师说》)。古代圣王实行井田制,将土地分配给民众耕种。战国秦汉以来则实行征收赋税的制度,变古代的“民养于上”为当今的“民无以自养”。很多帝王为了一己之私欲,横征暴敛,使天下百姓无以为生,以至于百姓揭竿而起,来反抗独夫民贼的残暴统治。黄宗羲对这一举动加以肯定,超出了封建儒者忠君报国的狭隘思想范畴。第三,君臣形成主奴关系。黄宗羲认为“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又说“非独至于天子遂截然无等级也”(《明夷待访录·置相》)。在他看来,君臣应该共治天下,彼此之间仅仅是分工合作的关系。而君主之所以受人敬仰仅仅是因为他起到了一个总领百官的作用,并不是因为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为君者视天下万民如草芥,视大臣如自己忠实的仆人,可以随意摆布大臣。以至于天下虽有百官而实际上只有一人在治理,百官只是一个传达指令的工具。试问天下之大,民众之繁,事务之多,仅凭一人之智又如何治理得好。君臣关系的现状使得天下万民深陷于苦难之中,因此,他主张恢复古时的那种“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君臣关系模式。君臣齐心协力,以天下为重,以道义为重,以万民为重,实现美好的治世。第四,无法治。黄宗羲认为,帝王行非法之法导致天下大乱。“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他认为要真正实行法治,使法律地位高于君主,高于每一个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社会进步。而今之帝王之法,皆是出于维护一家一姓的目的,“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这种法治实则不如没有法。这从根本上否定了秦汉以来的君主专制体制下的政治、法律、习俗等,从而猛烈地抨击了君主专制制度。黄宗羲将法律的地位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也是一大进步。

三、黄宗羲的理想政治模式——济世良方

黄宗羲理想中的政治模式是恢复“三代之法”,他主张恢复三代的井田制、封建、学校、卒乘之制。可见黄宗羲深受先秦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三代的政治社会情有独钟。但黄宗羲不是盲目主张纯粹的复古,而且他也知道这不现实。他在现实的基础上,结合西周汉唐制度中的一些合理成分提出了自己的救世主张。

(一) 恢复宰相制度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君主的权力不断加强,相权不断削弱直至消失是一大趋势。黄宗羲认为宰相制度对于治理天下是很有裨益的。他说“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明清之际,人们普遍把辅臣无权看作明代弊政和亡国的一大原因。黄宗羲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他认为废除宰相制度有三大弊端:一是君主更加轻视群臣,

使君臣之间形同主奴;二是不能补救君权传子之弊;三是朝政尽归于宦官。因此,黄宗羲主张恢复宰相制度。

1. 置相权以分君权。黄宗羲认为君主只是治理天下的工具,“古之君臣共治天下,皆因君主一人力有所不逮,智力不足故,设百官共治之。今之君主大权独揽,更无大臣辅之,以匡正其失,也无人能制之”。使其在最高权力的诱惑之下只图自己的享乐,而不管天下万民的死活。宰相乃百官之首,是百官同君主联结的纽带。凡国家大事,君主须同宰相及百官共议之,这样既可弥补君主的缺陷,也能以相权制约君权,使君主不敢肆意妄为。商王太甲不尊先王政令,伊尹以宰相将之放逐,后见其改过自新,便又将其接回来为王,时人莫不赞扬伊尹之贤。周公旦当时为成王的宰相,成王年幼,恐不足以威服诸侯,于是周公当国七年,后还政于成王,后人无不颂扬。但在君主专制政体下,仅仅用相权制约君权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君主的过失,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君主专制的本质。

2. 补救君主世袭的弊端。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变化,其中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在不断加强,贵族制逐渐被官僚制所取代。一方面是上层统治者在血缘宗法的基础上逐渐完善了世袭制并最终形成了长子继承制;另一方面在大臣的任用上打破了过去那种以血缘为纽带的世卿世禄制而形成了察举、推荐等文官制度。在君主专制政体下,王位的世袭以及对储君的才能的担忧一直是困扰着统治阶级的一个大问题。因为嫡长子未必都贤,但又不能打破这一继承制度,否则所引起的皇室内部对王权的争夺造成的危害会更大。黄宗羲认为宰相制度正好可以弥补这一弊端。如果君贤、相贤则天下太平,如果君不贤,则可以任用贤良之人出任宰相来匡正君主的不贤。

3. 消除宦官为政之祸。明朝阉党之祸尤为惨烈,其原因在于高皇帝废除宰相,而事事依赖宦官,宦官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名副其实的宰相。这些人从小长于深宫,且因身体的缺陷而导致人格的不健全,加之没有接受教育,更不了解民间疾苦。一旦大权在手,只会肆无忌惮为自己谋取利益。黄宗羲主张恢复宰相制度,由宰相、公卿、谏官与天子公议朝政,从而排除宦官专政的可能性。这是黄宗羲在革新现实政治的时候做出的一次努力。

(二) 设方镇御边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黄宗羲主张结合郡县制和方镇两种制度的优点,实际上就是将分封制和郡县制结合起来,在国家范围内同时推行这两种体制。黄宗羲认为“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边疆民族频频侵扰乃至入主中原,是废封建之罪也。黄宗羲目睹满族入主中原,于是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对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在秦朝就已经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央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又不是绝对的,往往会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一般到了一个王朝出现衰弱气象抑或是周边游牧民族入侵的时候,中央为了应对内忧外患,则不得不将权力下放到地方。黄宗羲认为“封建之弊,强弱吞并,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县之弊,疆场之害苦无已时”。为了兴利除弊,巩固边防,他认为“欲去两者之弊,使其并行不悖,则沿边设方镇可取”。黄宗羲的这一改革举措为我们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提供了一定的借鉴。设方镇御边,既不损中央之权威,又能应对夷狄入侵。具体做法是田赋商税听其征收,以充战守之用,这是给沿边方镇财政权。一切政教张弛,不从中制;属下官员亦听其自行辟召,然后名闻。教育权和官吏任免权也都给力延边方镇。延边方镇只需为中央尽守土御边之责,按时上贡即可。所谓的方镇就是拥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实体。这在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大趋势下或许也是难以实施的。

(三) 学校议政

宋代以后君主的权力不断加强。虽然宋朝的官制机构都是仿照唐制而设的,但谏官的职能已经是形同虚设了,到了元明时期,干脆取消了专职的谏议机构及相应的言官。在这种情况下,君主则更加闭目塞听,这会更加难以保证政令的正确性。于是,黄宗羲设计了学校议政制度,以达到评议朝政,对天子谏言的目的。黄宗羲认为学校议政是圣王之制。他主张天子“公其是非于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遂不敢自以为是,而公其是非于学校”。这一举措可以充分发挥士大夫的清议作用,起到对君主的监督作用。黄宗羲认为要很好地实行学校议政制度,学官一定由国家任命改为公议推举,非有重大失误,君主也无权撤销学官的职务。另外学校定期评议政治,天子百官必须接受舆论监督。他又提出了两个具体制度:一是天子定期亲临太学听谏制度。天子每月初一率百官到太学以弟子身份听太学祭酒讲学和批评朝政。这有利于扩大太学的影响力,从而发挥其议政职能。二是地方官定期接受士绅批评制度,这有利于加强对地方官的舆论监督,使其能够实心办事,黄宗羲提出的学校议政制度是一个创举,一旦能够真正实施,必会极大地促进思想解放,使人们能够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

由,只不过在君主政体下,又恰逢满族入主中原,这一制度也没有付诸实施。事实上黄宗羲的这一制度也只是在君主专制制度之下加入了贵族制的一些成分,并没有认可普通民众的参政权,这是历史局限造成的。

(四) 重定天下之赋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土地和税收问题是关系到君民关系、政治稳定和国计民生的大事。土地及税收的制度和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息息相关,因为这直接影响到百姓日常生活的幸福与否。中国的百姓只有在无路可走的时候才会揭竿而起。试看历史,历代王朝的灭亡都是由农民起义打头阵,甚至由农民起义直接推翻的。因此,一定要处理好土地和税收问题,给老百姓谋取实际的利益。黄宗羲认为秦汉以来,无论田制、税法都存在弊端,从而导致民生困苦,他主张重定田制,改革税法。所谓“重定天下之赋”,有四层含义:一是“履亩而税”。他主张按土地征税而不是现行的按户征税,这就可以让那些大地主无所遁逃,既能增加国库收入,也能减轻百姓负担。二是“任田不任用”。秦汉以来,税收的征收常根据君主的需要而改变。正所谓法无常法,民无所适从也。因此要制定完善的税收征收制度。三是“任土作贡”。即废除专以钱和银为赋,困瘁民生的做法。四是解决税额不齐的问题。就是重新丈量天下土地,并将土地按照土质分为五种,以此为根据作为征税的依据。黄宗羲的改革田制和税收的制度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去逐渐推行开来,较之以前的税收制度有一定的进步性。

(五) 提出工商皆本

黄宗羲批评“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他一反传统重农抑商的思想,提出了工商皆本。在黄宗羲看来,“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中国古代长期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使人们长期束缚在土地上。重农抑商的思想很明显是出于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使农民精于务农,则税收有所保证。使百姓安于一个地方,则有利于进行管理。重农抑商的政策长期压抑了中国人的思想,使中国百姓经常处于贫困之中,使中国社会停滞不前。黄宗羲认为实行工商皆本可以增加社会的财富,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这一思想是一大进步。

四、结语

黄宗羲对君主专制制度以及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反思和批判是深刻的、精彩的、激烈的。他提出的很多措施都是基于对天下百姓的同情基础之上的。他的反封建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若没有清朝政权入主中原,中国社会在黄宗羲等一批启蒙思想家的推动之下或许又是另一番模样了。作为落后的游牧民族的入主中原在一定程度上又强化了渐趋衰落的君主专制制度。而黄宗羲等人的思想在当时则被斥为大逆不道的思想,以至于清朝的君主为了控制人们的思想,大规模地兴起了文字狱,对中国社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而黄宗羲的思想仅仅在清初有一些小小的影响后便长期被尘封在了历史的长河中。直到近代维新派发起维新变法的时候,黄宗羲的思想起过积极作用,对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他的政治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精华,为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向近代民主思想的转变打开了一个缺口。

(责任编辑:徐雪野)